

丁作韶 與 維雅特

二十世紀變局中的知識分子友誼

Claude Hauser

克洛德·奧賽爾 著

吳殊、高秋芬 譯

China Shared: Ding Zuoshao—Auguste Viatte,
An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in the 20th Century

目次

前言	001
序章：一個友誼的故事	003
交錯的人生，裂變的中國	005
1 往來巴黎上海之間： 十字路口的友誼（1928-1930）	007
旅行的魔力，中國的魔力	010
中法友誼，相遇巴黎	017
2 面對獨裁主義危機：中國何去何從， 歐洲何去何從？（1931-1937）	027
中國的民族主義和獨裁的誘惑	029
以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為師？	033
投身政治，路途彌艱	040

3	戰爭與革命，分離與獻身（1937-1950）	049
	反日神聖同盟	050
	《遠東與我們》：維雅特的一部力作	059
	丁作韶：被戰爭裹挾的「普通中國人」	067
4	為了回憶的重逢：冷戰時期（1950-1956）	083
	對峙與游擊：冷戰的中緬戰場（1950-1953）	086
	亞洲反共主義輸出歐洲	098
	流亡之時，回憶之時（1954-1956）	112
5	裂變中國的兩個旁觀者（1957-1990）	119
	丁作韶，臺灣國民黨的體制知識分子	121
	面對臺灣國際地位的下降	128
	《時代訊號》：文化大革命之辯	137
	《孤軍》再出發	142
	結語	153
	附錄	
	丁作韶《孤軍（L'armée perdue）》書稿選譯	159
	照片集錦	177
	原始文獻與參考書目	193

前言

這本書始於一部未刊手稿的發現。手稿以法文撰寫，作者是中國法學家丁作韶。¹這是一部近似回憶錄的自傳體作品。丁是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1949-1955 年間與中國西南和緬甸邊境的反共游擊隊一同抵抗著解放軍的前進步伐，回憶錄講述的就是他這一時期顛沛流離的經歷。這部整潔的打字稿題為《孤軍 (L'armée perdue)》，長達百餘頁，夾雜在法國文學系教授奧古斯特·維雅特 (Auguste Viatte) 的私人檔案中，藏於伯倫特魯伊 (Porrentruy) 的瑞士汝拉州檔案館 (Archives de la République et Canton du Jura，簡稱 ARCJ)。他從一個有影響力的歷史參與者的個人視角，揭示了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幾年歷史中鮮為人知的一頁。儘管

¹ 在維雅特檔案中及丁作韶 1931 年在巴黎出版的博士論文中，丁作韶的名字均拼作 Ting Tso-chao。但本書法文原版採用當代通行的漢語拼音 Ding Zuoshao。

手稿的主旨是號召建立反共陣線，抵抗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它也讓讀者更廣泛地理解冷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緬甸、法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最後，它也觸及了法語世界知識分子的網絡和交流史，因為丁作韶的手稿是在 1950 年代以通信方式寄達他的朋友維雅特的。維雅特隨後對手稿進行了潤飾，但出版手稿全文的計畫始終沒能實現。儘管如此，這是一段值得為世人所知的歷史，也是本書將講述的故事。²

我最初的計畫是校注出版丁作韶的未刊手稿全文。然而，在研究這份罕見文獻來龍去脈的過程中，我發現儘管手稿經維雅特多方努力最終未能覓得出版商，但其中的大量材料曾被記者卡特琳·拉穆爾（Catherine Lamour）用於一部歷史與虛構參半的作品《關於一支地下軍的調查報告（*Enquête sur une armée secrète*）》。³鑑於此，我認為，對於這部丁作韶撰稿、維雅特校訂的「回憶錄」，與其僅僅重新推出一個更忠實的校注版，不如在更廣闊的視野下研究其撰著過程，全面回顧兩人間這場歷時和內涵都非比尋常的文化交流。一東（中國、緬甸、泰國、臺灣）一西（魁北克、法國、瑞士），一來一往，上百

2 我的研究興趣主要在思想史和國際文化交流史領域，2008 年以來，我有幸多次參加在上海舉辦的中法歷史秋季研討會，從而加深了我對當代史和中歐關係的瞭解。正是藉此機會，我最早於 2011 年 9 月，在以「共和」為主題的一屆研討會上作了題為〈共和危機時期的中歐之遇：丁作韶與維雅特（1928-1949）〉的報告。這場報告便是本書的前奏。

3 Catherine Lamour (卡特琳·拉穆爾), *Enquête sur une armée secrète* (關於一支地下軍的調查報告), Paris: Seuil, 1975.

封書信逐漸將七十餘年的一段文化交流展現在讀者面前。

序章：一個友誼的故事

從 1920-1930 年代之交開始，還在巴黎求學的丁作韶和奧古斯特·維雅特就開始了以智識的交流和合作為基調的友情。這場交流貫穿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丁作韶 1931 年回國，1937 年中日戰爭的爆發暫時中斷了這段中歐友誼。1940 年，隨國民黨領導層撤退至重慶的丁作韶站在蔣介石一側堅持抗戰。在此之後，他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識形態將促使他以具體的政治和軍事行動反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在決定性的 1948-1949 年間，時任天津市參議會議員的丁作韶在共產黨軍隊進入北平前倉促逃離，在他的故鄉河南短暫避難。隨著解放軍進軍的腳步，他不得不再次啟程趕往上海，並於 1949 年 5 月初，從那裡隨著數以千計追隨蔣介石的中國難民，登上了開往臺灣的船。他在臺灣只停留了四個月，在島上的報刊積極撰文，號召人們抵抗共產黨政權。他是乘著國民黨軍的專用飛機返回中國大陸的，落腳點是四川成都，他從那裡南行前往臨近的雲南，與率領國民黨軍殘部堅持游擊戰反抗新政權的李彌將軍會合，試圖在後者麾下繼續反共抗爭。在一段驚心動魄的跋涉後，丁作韶撤到緬甸邊境，隨後轉往泰國，在那裡堅持意識形態抗爭直到 1950 年代中期。他最終在孤立和失意中回到了臺灣。

丁作韶、維雅特二人 1940 年中斷通信，直到 1952 年才重新恢復。這之後不久，丁作韶開始撰寫題為《孤軍 (L'armée perdue)》的回憶錄。維雅特鼓勵著他，承諾對他的法語寫作進行潤飾。通過回憶，並對這段當代史進行對己有利的重構，丁作韶在某種程度上遙遙呼應著他歐洲友人失落的理想：維雅特曾期待，戰後的世界將是一個東西方共築民主、共和以及人類精神價值的世界。二戰期間，維雅特已移居加拿大，在那裡他作為亞洲問題評論家的敏銳得到了一致公認。在他 1942 年於蒙特婁出版的《遠東與我們 (L'Extrême-Orient et nous)》一書中，維雅特強調，必須抵抗極權主義和「使原始野蠻死灰復燃的偶像崇拜」所帶來的毀滅。他呼籲，為了中國，也為了亞洲和世界的未來，必須重振基督教價值，使東西方能攜手齊心，捍衛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1950 年代中期，當兩位好友恢復了書信聯繫時，漫長的冷戰開始，亞洲硝煙四起，受害至深，世界的政治社會現實與這些理想的落差不可以道里計。丁作韶和維雅特的聯繫一直維持到 1980 年代末。他們的交流是個人層面的，有時甚至是私密的，但他們的通信中也包括大量對外部政治事件的評論。丁作韶生命的最後十年中，他們的通信逐漸變得重複、間斷。丁作韶於 1990 年在臺灣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交錯的人生，裂變的中國

本書作為一部史學著作，其首要目的是通過第一手材料——通信、回憶錄、報刊文章——重建兩位知識分子友誼的歷史。友誼的雙方，一是中國人，在法國接受了法律教育，返回中國後投身政治軍事戰場，戰後成為成功大學教授兼訓導長。另一方是瑞士人，佛立堡大學博士，在 1930 年代獲得法國國籍，並在巴黎索邦大學獲得法國文學的國家博士學位。他於 1933-1949 年間在魁北克拉瓦爾大學任教，在短暫任教於南錫大學之後，於 1952 年被任命為蘇黎士聯邦理工學院教授。如果說，這種對兩條交錯的人生軌跡的追述，使得本書更偏向社會和思想的微觀史，我們也希望通過一份綿延數十年的通信，將它寫成關於兩個不同的中國形象表徵（representations）的歷史。從兩個個體觀點的交流到兩種文化的匯通，其間產生的中國形象折射出整個 20 世紀中歐交流更廣闊的畫面。這同時也是一幅更為多元的畫面，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國自身正處於兩大陣營的對立中，它們之間曠日持久的內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多年之後仍未平息。由此引發了諸多問題。首先，本書兩位主角之間的友誼——以及思想交流——如何影響他們各自對這一時期歐洲和中國社會的理解？其次，丁作韶和維雅特通信交流的重點何在？他們的通信是友誼為先，還是學理為主，是屬於兩個人的思想實驗室，抑或是聯結了更多同道的交流網絡？他們對歐洲、中國和臺灣的看法在這半個世紀裡如何轉變？作

為旁觀者，抑或作為參與者，兩位知識分子如何評判自二戰結束到 1960-1970 年代之交，中國發生的種種革命事件？關於丁作韶所生活的，蔣介石獨裁統治期間的臺灣社會與文化，這些書信又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最後，在冷戰時期鐵幕緊鎖的文化氛圍中，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丁作韶堅持撰寫回憶錄的決心（他的經歷在鼓勵他寫作的維雅特看來，是舉世罕見、甚至可稱英勇的壯舉）？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進入本書的正題。